

民国以来 慈善救济事业研究

本书以专题形式对民国以来慈善救济事业进行了深入研究。全书共分五编，第一编从理论层面对民国救济思想、救济立法、救济行政、救济机制等进行了梳理；第二编和第三编从组织和区域的视角，详细考察了民国慈善救济事业的绩效与水平；第四编以当代慈善救济为研究范畴，分别从慈善意识、慈善文化、慈善捐赠、慈善组织及企业慈善等角度，对当代慈善热点问题进行了前瞻性探讨；第五编关注民间组织，涉及民间信仰、民间组织形态与现象，以及政府与民间组织关系等问题。

◎ 蔡勤禹 李娜 著





社会史丛书

民国以来 慈善救济事业研究

◎ 蔡勤禹 李娜 著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国以来慈善救济事业研究/蔡勤禹,李娜著.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7

(社会史丛书)

ISBN 978-7-201-06500-7

I. ①民… II. ①蔡…②李… III. ①慈善事业—研究—中国②社会救济—研究—中国 IV. ①D632.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034195 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 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市同利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2010 年 7 月第 1 版 2010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787×1092 毫米 16 开本 22.75 印张 2 插页

字数:300 千字

定价:39.80 元

自序

我从学术层面接触慈善至今正好10年。在这10年中,中国慈善事业迅速发展,慈善组织不断壮大,慈善文化日益普及,慈善研究日趋繁荣。更为可喜的是,慈善事业近几年受到国家高度重视,中共“十七大”明确提出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慈善事业为补充,加快完善社会保障体系。民政部在2008年9月成立社会福利与慈善事业促进司,意在进一步推进与健全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相衔接的社会保障体系,对中国慈善事业的发展更是意义深远。在这样的背景下,将10年来对民国及当代慈善与社会救济事业研究的成果结集出版,既可以为成长中的中国慈善事业助一把力,又可为学界同仁交流以便利。

本书内容分为五编,前四编主要围绕着民国以来慈善与社会救济内容展开。具体分为:

第一编《民国社会救济思想与制度》,主要研究民国政府的社会救济思想、救济行政、救济立法、救济机制及救济实践。

第二编《民国慈善救济的一个案例》,着重研究了一个慈善组织——民国华洋义赈会的历史演变、组织结构、功能活动及其社会特性。

第三编《民国慈善救济的区域性个案研究》,侧重考察了在不同政权下慈善与救济在不同地区的实施及呈现的多样性特点。

第四编《当代慈善文化与制度建设》,重点研究当代慈善意识、慈善文化、慈善组织、慈善捐赠、慈善动员及慈善呈现的新特点。

第五编《多元视角下的民间组织》,通过对民间组织几种形态及其功能研究,分析在现代化进程中国家社会控制政策及民间组织面临的问题与挑战。本编内容与本书主题相去较远,但多年来笔者对民间社会一直关注,并投入一定精力进行研究,是故结为一编,以饯读者。

蔡勤禹

2009年11月于青岛

目 录

第一编 民国救济思想与制度

一、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的演变	(3)
二、民国的社会救济行政	(15)
三、民国的社会救济立法	(23)
四、民国慈善组织分析	(32)
五、民国政府的救难机制	(41)
六、民国政府的救灾机制	(49)
七、民国政府的失业救济	(57)

第二编 华洋义赈会——民国慈善救济的一个案例

一、传教士与华洋义赈会	(69)
二、传教士在近代中国救灾理念与实践	(79)
三、华洋义赈会的善款筹集	(86)
四、华洋义赈会的信用合作	(93)
五、华洋义赈会的以工代赈	(106)

第三编 民国慈善救济的区域性个案研究

一、青岛开埠与慈善公益事业兴起	(121)
二、民国青岛红十字会	(146)
三、民国青岛商会及其慈善活动	(156)
四、南京大屠杀中的慈善组织	(164)
五、国民政府与江淮水灾救治	(177)
六、山东抗日根据地的社会保障	(190)

第四编 当代慈善文化与制度建设

一、当代慈善意识论	(211)
二、当代慈善文化建设	(221)
三、当代慈善组织关系	(225)
四、当代慈善捐赠机制	(234)
五、当代企业慈善	(243)
六、当代志愿动员	(252)
七、当代救灾特点	(264)

第五编 多元视角下的民间组织

一、现代化进程中的民间组织	(277)
二、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工商业团体的管制	(286)
三、小农经济下的渔民组织及其职能	(295)
四、民间宗教的“八字真言”信仰	(310)
五、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社会心理分析	(321)
六、明清时期民间宗教的教级制度	(329)
七、新中国成立初期青岛对会道门的取缔	(336)
八、近年帮会团伙犯罪特点与趋势	(347)

鸣谢	(358)
----------	-------

第一编 民国救济思想与制度

一、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的演变*

从 19 世纪中叶到 20 世纪中叶,中西思想接触、碰撞、交流,频繁往复,从未间断。在这一时期,西方的政治、社会等学说纷至沓来,中国上千年以儒家为正统的主导思想受到削弱,西方社会思想渐趋走强。其中,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思想在这股激荡的洪流中发生蜕变,一种适应近代潮流的社会救济思想在古老的东方大地上发展起来,成为思想百花园中的一朵奇葩。

1. 近代社会救济思想的勃兴

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的勃兴和发展大约经历了清末与民国两个阶段。如果说以“养”为目的、人们被动承载救济的传统社会救济思想是农业文明的产物,那么,“以教代养”为内容的近代社会救济思想则是工业文明的结果。众所周知,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走上了坎坷曲折的工业化之路,从此,中国传统的社会救济思想伴随着工业化的展开和西方社会思想渗入,逐渐挣脱历史的羁绊,日益融入近代工业文明之中。

从 19 世纪六七十年代开始,一批“睁眼看世界”的思想家,通过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认识到了国家贫穷落后和人民穷苦潦倒的根由,提出了一系列社会救济思想主张,形成了近代中国思想史上第一次社会救济思想的研究高潮。其精深的观点主要有:

(1)“富国养民”说

晚清思想家,多有兴办洋务的实践,又有出使西洋的经历,在自己亲身实践和与西方接触中,他们逐渐认识到中国贫穷之因在于实业不振、“养民无术”,因此,他们提出通商互利、“富国养民”的观点。当时,王韬提出“持商为国本论”,薛福成提出“商握四民之纲说”,马建忠提出“富民说”,陈炽提出“富国策”,郑观

* 本文与李元峰合撰。

应提出“商战固本论”等观点。这些观点是对传统社会“重本抑末”“贵义轻利”思想的巨大冲击。在这一方面,薛福成的见解尤为深刻。他在深入考求欧洲工商致富本原的同时,不断思考中国工商何以落后于欧洲这个问题。他看到西洋诸国工商业发达的情景后,深有感触地说:“夫商为中国四民之殿,而西人则恃商为创国、开物、成务之命脉,迭著神奇之效者,何也?盖有商则士可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可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可售其所作而作益勤;是握四民之纲者,商也。”^①而中国数千年来将“富者”谓之“贱丈夫”、“守财虏”,“中国用人以富者为嫌”,这种“重农抑商”指导思想是国穷民困的主要原因。基于这种认识,他认为要改变中国贫穷落后面貌,必须倡导“重商”“富民”政策,民富才能国富,民与国皆富,则可以备水旱之灾。为了“富国养民”,他认为一方面要广开利源,“利源开则物力阜,物力阜则不但可以据本固之利,且可以取外国之利而用之”。^②另一方面,发展生产力,“用机器殖财养民”。这种将生产力发展与“富国养民”和救济贫困结合起来的的思想,抛弃了传统的“仁义”学说与迂腐的道德说教,高扬功利主义,反映了社会所发生的深刻变化。

(2)“振兴实业”说

随着清末外来商品的冲击和中国自给自足小农经济的破产,社会上游荡无事之民增多。如何救济日益增多的游民,成为思想界关注的又一重要社会问题。在晚清一片“振兴实业”的口号声中,有的人提出,救济游民,应推广工艺、振兴实业。薛福成说:“余观西洋用机器之各厂,皆能养贫民数千人或数万人。”“盖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富商;不用机器以造物,则利归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如膏渐消而火自灭,后患有不可言者矣。”他还提出,不仅要发展机器,还应发展采矿业,扩大人们致富门路。他说:“夫开一矿,仰食者不下数万或数千人。果能养数万人,是不啻得十万亩良田也;能养数千人,是不啻得一万亩良田也。”^③晚清另一官员夏敦复说:“现在京师地面,虽已设立工艺厂数处,然均为抵制洋货起见,雇佣工人有限,而于无业游氓,沾被尚鲜,以至鹄面鸠形之辈,游荡无籍之徒,仍复接踵于道。……是非推广工艺,实力举行,不足以矜民生而副明诏,相应请旨伤下商户二部,会同顺天府五城御史,博采章程,广筹经费,多立厂局,切

①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岳麓书社1985年,第82页。

② 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庸庵海外文编》卷三。

③ 同上。

实举行，专收无业之民，咸令各习一艺。”^①然而，晚清朝野也有所谓“中国人民之众，十倍于各国”，“若广用机器，不啻夺贫民之生机，使之不能自食其力”的议论。针对这种保守排外观点，薛福成据理反驳，他说：“然行使是说也，则必有人所能造之物，而我不能造者……其物之为人所争购，必不能与西人之物……相敌也明矣。自是而中国之货，非但不能售于各国，并不能售于本国。自是而中国之民，非但不能自食其力，且知用力之无益，而遂不自用其力。……民生有不日困，国势有不日蹙者哉？”^②从正反两方面对比中，晚清思想界已认识到“闭关锁国”、排斥新兴生产力，不是“养民之法”，只有振兴工艺、发展生产才是消弭贫穷的治本之策。

(3)“推广铁路轮舟”说

“积谷备荒”是古代荒政的重要内容之一。古有“耕三余一，耕九余三”之说，反映了小农社会，人们重节俭而轻扩张基业的观念。但到近代，人们将新的生产力与社会救济联系起来，提出“建仓储不如推广铁路轮舟”的思想。铁路轮舟等近代交通工具的发明，推动了社会救济的快速发展，缩短了人们的空间距离，提高了人们出行逃亡的速度和救荒的效率。薛福成认为，兴建铁路，除了可以方便、快捷地将物资迅速运送到目的地，从而在救灾过程中赢得时间外，还由于需要“有修路之工，有驾驶之人，有巡瞭之丁，有路旁短送之车马，有上下货物伺候旅客之夫役”^③，可以大量增加人们的就业机会，扩大人民生计。

(4)“以教代养”说

中国传统救济思想以“养”为主，救济对象主要是孤、独、鰥、寡四民。《礼记》有云：“此四者天民之穷而无告者也。”盖由于救济对象身体的限制，传统社会救济设施无论官办还是民办，都将收养孤贫之人，为其提供食宿，病者就医调理、死者施棺埋葬作为经常性救济方式。这种“重养轻教”的救济方式，积久弊生，会助长被救济者的依赖思想，再加上办理不善，救助失平，使救济事业裹足不前。随着近代与西方接触交流增多，晚清思想界目睹了“教”在社会救济中的作用。出使英国的刘锡鸿记下了英人教养之法：“贫儿无力就学者，则收之以义塾焉。都会乡镇各有义塾，自数所以至数十所，每所延师数人以至十数人，均按

① 《光绪朝东华录》(五)，中华书局1984年，总第5160～5161页。

②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第927～928页。

③ 薛福成：《创开中国铁路议》，《庸庵文外编》卷二。

其地大小酌行之。……学徒皆居宿于塾,供其衣服、饮啖,不听他出。”^①郭嵩焘于1877年3月参观伦敦一家针织厂时,观察到“多世家妇女贫者,以手工自食其力。国人募金为院,使习艺其中。询之,妇女通计百五十人,分六院。其一专司绘写,大小异式,分送各院织绣”^②。西人对弱势群体的这种积极救济方法,促使思想界反思中国传统以养为主救济的弊端,审视“教养并重”在近代社会救济事业中的重要性。他们强调“凡街市乞丐、无业游民,收入院中,教以浅近手艺,至艺成足以自养而后令去。不徒养之,而又教之。盖养之者,饱暖一时;教之者,饱暖终身也”^③。“教”因人而异,或教之文化知识,或教之生产技艺,总之,使收养之人获得基本的谋生手段。

(5)“节制人口”说

人多地少的矛盾在清朝前期就已出现,以后这一矛盾在某些地区更加突出。晚清不少思想家已经看到人多地少是造成贫穷之原因,汪士铎说:“世乱之由,人多;人多则穷……人多而气分,赋禀而随薄,又濡染于风气,故人才益难。”^④人口过多,使得人们的才智分散,从而人口的质量也会下降。薛福成也指出了人口增长速度大大超过生活资料增长速度所产生的恶果,“昔供一人之衣食,而今供二十人”,“昔居一人之庐舍,而今居二十人”,使得人们“生计之艰,物力之竭,日甚一日”,“凡山之坡,水之浒,暨海中沙田,江中洲沚,均已垦辟无余”。^⑤人们谋生艰难,必流为游手、佣丐、会匪,为害社会。因此,必须采取措施,控制人口增长。汪士铎提出的控制人口增长方法是:对违法之徒,取严刑峻法,“以刀兵消息之”;加重多子女的赋税,“家有两女者,倍其赋”,家有三男者,倍其赋;提倡男女独身,“民之请为僧尼者赏”;推行晚婚,女子“二十五而嫁”,男子“三十而娶”;“广施不生育之方药”和各种断胎冷药,进行避孕。^⑥薛福成提出“善寻新地”,向海外移民,鼓励外国来华招募劳工,“或佣工,或贸易,或艺植,或开矿”,如此,“不啻于中国之外,又辟一二中国之地,以居吾民,以养吾民”的效果了。^⑦这些言论,或尖锐、或深刻,有些意见虽过于偏激,但像采取避孕方法节

①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英轺私记》,岳麓书社1986年,第207页。

②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伦敦与巴黎日记》,岳麓书社1984年,第182页。

③ 许象桓:《泰西善举中国能否仿行》,《经世文三编》卷三十五。

④ 汪士铎:《汪梅翁乙丙日记》卷三。

⑤ 薛福成:《许巴西、墨西哥立约招工说》,《庸庵文外编》卷一。

⑥ 汪士铎:《汪梅翁乙丙日记》卷三。

⑦ 薛福成:《用机器殖财养民说》,《庸庵海外文编》卷三。

制生育的思想还是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上述言论,言辞恳切,反映了清末思想界对社会救济问题思考的深度和广度。

2. 近代社会救济思想的发展

近代中国战争硝烟难尽,但工业化仍在踟躅而行,中西方文化交流也在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进行。晚清对西方社会救济思想的介绍、吸收,为民国思想界提供了超越前人的基础。在近代化的潮流中,近代思想界进一步看清了中国传统社会救济的弊端,在批判反思基础上,开始构建新的社会救济制度。

首先,对中国传统“宗族救济模式”提出批判。中国是一个“伦理本位”国家,人与人之间形成一定的血缘关系,血缘关系是社会最恒定持久的关系,由血缘关系表现出来的家庭和宗族的形态成为传统社会的基本组织形态。宗族救济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救济方式。这种救济方式存在数千年,有其合法性依据。众所周知,在传统社会,社会的生产关系是以小型而分散的小农社区为基础的。在这种小型社区里,“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支,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①。这种理想式的小农经济社会反映出家庭不仅承担了生产、生育的功能,而且具有抚养、教育、赡养等功能。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血缘组织,虽抑制了社会功能的分化,却反映了在生产落后、国家救济功能深入不到的乡村之下人们的一种社会需求。但随着近代社会分工和人口流动的加快,宗族救济模式的狭隘性也显露出来。郑观应在比较中西社会救济模式不同时指出:一方面,西方民众的宗教观是其慈善机构特别发达的思想基础;另一方面,西方社会具有一种公共精神,乐于为社会奉献。相比之下,中国虽然富翁不少,但缺乏公共精神,只想将财产留给子孙,为子孙奠定一份基业,使后代免受饥饿之苦。这种“宗族保障”模式,阻碍了中国社会事业发展。这是中国慈善事业不发达的根由所在。^② 清末大儒康有为在先贤思想的基础上,更将宗族救济弊端概括为四:(1)“人各私其家,则不能多得公费以多养医生,以求人之健康,而疾病者多,人种不善。”(2)“人各私其家,则无从以私产归公产,无从公养全世界之人而多贫穷困苦之人。”(3)“人各私其家,则不能多抽公费而办公益,以举行育婴、慈幼、养老、恤贫诸事。”(4)“人各私其家,则不能多

① 《孟子·滕文公》(上)。

② 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第526页。

得公费而治道路、桥梁、山川、宫室,以求人生居处之乐。”^①在这种宗族救济模式里,举办大众福利事业阻力重重,因此,必须打破宗族藩篱,施“博爱”于天下。

其次,将中国古代大同思想与西方社会福利思想结合起来,构建新的社会救济制度。康有为设计了一个“公养”、“公教”、“公恤”的“大同社会”。^②所谓“公养”,即妇女怀孕后即入政府组建的“人本院”,实施胎教,婴儿出生后,由公立的“育婴院”、“慈幼院”之类福利机构抚养;“公教”是要普及全民义务教育,实现从小学到大学由公教机构实行义务培养,使社会的每一个成员都能得到良好训练,以便更好地服务于社会;“公恤”是指人在残、老、病、死时能够享受到社会提供的福利。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家孙中山更将“安老怀少”、实现民生主义作为其理想社会的奋斗目标。他通过考察欧美各国社会政策,进一步指出:“谋国者,无论美、英、德、法,必有四大主旨:一为国民谋饭吃,二为国民谋穿衣,三为国民谋居室,四为国民谋走路。”^③“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不但是要把这四种需要弄到很便宜,并且要全国的人民都能享受。所以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造成一个新世界,就要大家对于这四种需要,都不可短少。”^④他还说:“民生主义要做到:少年的人有教育,壮年的人有职业,老年的人有养活,全国男女,无论老小,都可以享安乐。”所以,对于“育幼、养老、济灾、医病与种种公共之需”,乃至“聋哑残废以济大造之穷,公共花园以供暇时之戏”都要筹划办理,“把中国变成一个安乐国家”,才算是民生主义的完成。^⑤这些救济思想虽带有空想色彩,却反映了人们对大同世界的强烈渴望,在中国社会思想发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再次,废除将社会救济视为怜民、爱民的传统观念,确立人民有难、国家有责的现代意识。近代以来,“主权在民”的思想通过辛亥革命的实践进一步深入人心。根据西方启蒙思想家的政治学说,人的理性所昭示的自然法则在支配着人们的行为,人们都是平等和独立的,任何人都不得侵害他人的生命、健康、自由和财产。“人类天生是自由的”,这是资产阶级政治学“天赋人权”观念的最早表述。英国资产阶级思想家洛克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⑥资产阶级国家起源学说表明:国家

① 康有为:《大同书》,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第189页。

② 同上,第280页。

③ 孙中山:《中华民国之意义》,转引自王昇:《三民主义研究》,(台湾)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73年,第202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第222页。

⑤ 蒋介石:《民生主义育乐两篇补述》第一章“序言”,(台湾)中央文物供应社1975年。

⑥ 洛克:《政府论》(下篇),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76页。

由人民组成,国家权力由人民赋予,当人民利益受到损害时,国家有责任来保护和给予救助。在这种现代政治观的基础上,功利主义代表边沁对政府在社会福利方面的作用进一步研究,他认为:“政府唯一应该追求的目标是社会最大可能的幸福。个人的幸福将由于他的痛苦的减少或其程度的降低而得到增加。……个人的享受基本上应由他自己去考虑,政府行动的原则是保护个人免受痛苦。”^①在边沁看来,生存富足平等安全是幸福的标准,政府必须根据人们“避苦求乐”的天性,通过立法来干预贫困问题。西方国家起源的社会学说和功利主义观点在清末民国输入中国后,进一步使思想界认识上升到一个新台阶。他们认识到:在现代社会,“人民之于国家,休戚相关,患难与共,其于救济事业,自当视为政府对于人民应尽责任。”^②孙中山曾将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比较后说:“新世界国家,与以前国家不同,通常国家仅能保民,而不能教民养民。……今日所抱改造新世界之希望,则非徒保民而已,举凡教民养民,亦当引为国家之责任。”^③衣、食、住、行是人的基本需求,“一定要国家来担负这种责任”。如果国家做不到这一点,“任何人都可以来向国家要求”^④。对西方社会救济制度颇有体悟的一名社会工作者说:“国家为人民聚集而成,政府乃由人民组织,而为人民谋福利之机关,人民有所困苦,则应加以救济,人民有所需要,自当俾与协助,此乃贤明政府所应负之责任。”他还说:“各国多认社会救济乃政府对于人民之一种重要责任,在人民方面,则为一种应享之权利。”^⑤蒋介石在谈到社会救济时也说:“今日的社会救济,并不纯是一种以悲天悯人为基础的慈善施舍,而是在义务与权力对等的观念中,以及在社会的连带责任观念中,政府与人民应有之责任。”^⑥由此可见,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权观念已经在民国产生影响,成为为政者、思想界和社会工作者分析和解决社会问题的指导理念。

复次,改变以小农经济为基础的社会救济方式,推进工业化,使中国社会救济建立在近代工业基础之上。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发展和工商业城市的出现,社会分工加快,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受到冲击,“男耕女织”的生活方式被打破,世代依附于土地的大量劳动力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形成了对工商业城市的巨大压力。如何吸纳庞大的过剩人口,减少社会失业,成为社会近代化面临的一个

① Jeremy Bentham, "Theory of legislation", London, 1894, pp95~98.

② 洪兰友:《社会救济的立法精神》,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99辑,第5页。

③ 孙中山:《中华民国之意义》,转引自王昇:《三民主义研究》,第172页。

④ 孙中山:《三民主义》,岳麓书社2000年,第237页。

⑤ 陈凌云:《现代各国社会救济》,“序言”,商务印书馆1936年。

⑥ 谢微孚:《中国新兴社会事业之功能与目的》,秦孝仪主编:《革命文献》,第100辑,第2页。

新课题。民国思想界认为,应发展中国工业,因工业化具有吸附力,不仅可以将失业群体吸收,还可以使中国摆脱贫穷落后面貌。他们认为:第一,发展民族工业,增加生产,才能战胜强敌,求得民族的真正解放;第二,解救工厂倒闭、商业凋零、农村破产等一系列国民经济危亡问题,非发展民族工业使国民经济机构高级化不可;第三,使人民大众摆脱贫困化,必须通过振兴工商业来提高一般大众的生活水平;第四,发展工商业,可以打开农产品的销路,减少农村中的失业人口;第五,工业的发展,可以促进社会保障事业的发展,使失业的人能够享受到社会保险或救济。^① 民国学者的这一看法,突破了晚清思想界偏重于经济层面考察工业化局限,而将工业化置于经济和社会两个层面来考察,显示了民国思想界思考问题的深度。

人口压力一直是近代中国面临的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因而,由人口过密化引发工业化成为民国思想界的研究课题。有的人提出,要提高农民生活程度,减少社会贫穷,需要在如下几个方面努力:一是实行移民殖边,发展实业,由工厂吸收过剩人口,使人口不致过密;二是扩大农场面积,降低人口密度;三是节制生育,控制人口数量;四是利用机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生产费用;五是发展交通,使农产品销路畅通,增加农民收入。^② 作者把工业化作为解决农村人口过密化问题的途径之一提出来,显示了其强烈的问题意识和思考的前瞻性。还有不少学者从中国这个农业大国的国情出发,认为农村应该提倡“农村工业”,利用农村原有的手工业,先施与科学化的整理与辅助,尔后再创办新工业,利用农村廉价的劳动力和原材料进行生产,直接力谋农民生活程度的提高,消解农村剩余劳动力,间接增厚国家整个的经济实力。^③ 作为一种思想,这种观点具有相当价值,已触及到在中国这样一个农业大国,如何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出路这样一个重大现实问题。

上述言论,既指出了传统社会救济的弊端所在,又指明了变革的出路,并设计了未来社会救济方案。其中不乏空想或偏激之说,但言辞恳切,反映了时人对社会问题的深入思考,对弱势群体的特殊关怀。通过对晚清民国思想界关于社会救济思想的梳理,我们可以看到近代社会救济思想体现了“以教代养”的积极救济理念和国家对民负责的义不容辞责任,这是“主权在民”政治观念在社会

① 袁聘之:《论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心问题——重农重工问题的探讨》,《东方杂志》第32卷,第16号。

② 乔启明:《中国农民生活程度之研究》,《社会学刊》第1卷,第3期,1930年。

③ 金轮海:《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中华书局1937年,第403~404页。

救济思想中的体现,表明中国社会救济思想已经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3. 近代社会救济思想演进动因

近代中国社会救济思想的勃兴与发展,其张力主要来自于西方社会思想的冲击和影响。19世纪中叶,久已闭锁的国门被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打开,从此,中西文明的接触进入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梁启超在总结中西方接触的历史阶段和特点时认为,中国人对西方文明经历了一个从对抗,到认同、接受和模仿的过程。“第一期,先从器物上感觉不足。这种感觉,从鸦片战争后渐渐发动……很觉得外国的船坚炮利,确是我们所不及……于是福建船政学堂、上海制造局等等渐次设立起来。……第二期,是从制度上感觉不足……所以拿‘变法维新’做一面大旗,在社会上开始运动。……第三期,便是从文化上感觉不足。”相对于器物的变革,制度与思想文化层面的变革要漫长的多,“从甲午战役起到民国六、七年间止。……这二十年间,都是觉得我们政治、法律等等,远不如人,恨不得把人家的组织形式,一件件搬进来,以为但能够这样,万事都有方法了”^①。就西方社会救济思想制度对中国的影响来说,主要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 西方“教民”之政的冲击

在国人尚未踏上西方土地之前,对西方优势的理解尚处于器物层面,随着中西使节的往来,19世纪后期,人们开始把目光转向制度层面,冯桂芬、刘锡鸿、薛福成等早期出使西洋的中国人,开始从社会视角分析理解西方强盛之本源。冯桂芬曾撰文专门评述介绍荷兰的社会救济制度,他写道:“荷兰有养贫、救贫二局,途有乞人,官若绅辄收之,老幼残疾人养局,廩之而已。”^②在他看来,西方的强盛之源自有不同于中国者,而收养贫民的社会救济制度就是其中一种。由此,冯桂芬开辟了从社会视角分析理解西方文明强盛本源的新路径。薛福成经过对英、法、意、比四国考察,对西方强盛本源作了系统总结。他说:“西国富强之原……约有五大端:一曰通民气,二曰保民生,三曰牖民衷,四曰养民耻,五曰阜民财。”^③在这里,薛福成不再把“西法”仅仅看成过去所认为的“制造、军火船械”,而是进一步强调政治变革的重要性,并将其列于富强原由之首,反映了他

① 梁启超:《梁启超文集》,燕山出版社1997年,第450~451页。

② 冯桂芬:《采西学艺》,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54页。

③ 钟叔河主编:《走向世界丛书——出使英法比四国日记》,第802~803页。